

城市拆迁改造对邻里初级群体的影响

陈伟

(香港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香港特别行政区 852)

摘要 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的拆迁与改造是一个必然趋势。在城市面貌因此而发生变化的同时,城市改造给城市居民的邻里初级群体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产生了许多社会成本。城市房屋拆迁作为一种土地资源再配置的方式、手段,在实施过程中也将意味着居民们会弱化原来邻里之间的互动关系、情感联系和相互建立已久的认同感。

关键词 城市改造 初级群体 社会成本 社区归属感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07)03-0039-05

一、研究对象简述

邻里,在社会学中被称做基本群体。基本群体,又可叫做首属群体或初级群体,是指经常面对面的直接交往所形成的具有紧密的人际关系的社会群体^[1]。作为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单位,它们承担着社会化的任务,是社会的稳定力量。而邻里则是其中最典型的。

邻里是地缘相邻并构成互动关系的相对独立的小群体^[2],其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如相互支持的功能、教化邻里中的居民和儿童的社会化功能、社会控制的功能及交流功能等等。古有“远亲不如近邻”之说,也更证明了邻里关系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作用之大。但在拆迁之后大部分居民已经很难重建和谐的邻里关系了,原本邻里之间的互动关系、情感联系和相互建立已久的认同感也因拆迁渐渐消失殆尽。甚至,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住房结构的个性化,高层建筑的主导地位,都使得如今的邻里多处于一种“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的境况。为了进一步了解城市拆迁改造对初级群体方方面面的影响,走进居民的生活,以一种近距离的角度去观察,会得到更深切的感受。的确,从笔者在南京下关区沿江开发过程中所做的社区调查来看,城市拆迁确实冲击着居民们原本牢固的邻里关系。

拆迁不仅意味着简单的土地资源再配置,更意味着原住群体的利益流失及后继资源的协调和重置。变化是必然的,而最能直接感受到这些变化的,要属处在最前沿的基本群体了。在系列调查与对居

民的深度访谈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拆迁给他们带来的关系变动与适应不良,邻里原有功能的淡化和丧失以及新社区内居民归属感下降,社区人际网络难以重建等问题。

二、调查分析与问题讨论

1. 拆迁后邻里关系的变化

社会学认为,邻里是一个互动群体,是以地域关系纽带、以感情为基础,受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制约的非正式群体。正因为它的这些特点,在社会生活中,它发挥着特殊而不可忽视的社会作用。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邻里关系及其作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变化的。研究表明,现代邻里关系不仅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还出现了淡化的趋势。的确,从对拆迁居民生活调查资料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些变化,尤其对于下关区这样的老城区的老住户们来说,拆迁似乎意味着失去更多的人文资源。在详细了解了拆迁户之前生活的邻里环境,又跟踪访谈了他们搬迁后的邻里生活之后,笔者发现,前后的邻里关系可谓大相径庭。

(1) 相互支持功能的弱化

所谓相互支持,主要是指邻里之间相互提供保护和支持,使邻里间有安全感和信任感。具体表现在生产上、生活上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共同解决生活难题,共同防御,共同保障社会治安等。但是,现代高层单元住宅的兴起,却给邻里之间的交往带来了屏障。拆迁户一旦住进这种住宅,各家设施完备,自成体系,缺乏相互交往的公共场所。住宅之间的

封闭虽然减少了邻里间的矛盾,却也阻碍了他们正常必要的交往。彼此之间缺少最起码的认识和沟通,互助系统难以构建。

(2) 社会化功能的削弱

现代教育强调要把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而邻里就是社会教育的重要方面。因为邻里间能形成一种价值氛围,并以此教化邻里中的居民和儿童^[3]。生活在同一地域里的各个家庭及其成员之间相互影响是很大的。而这样一种价值氛围的创造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构的,它需要相当长时间的邻里接纳和融入。但拆迁恰恰使原本的邻里结构及其氛围遭到破坏和拆散。同一血缘、同一业缘的人居住在一起的传统结构一经拆散,就使得众多陌生的并无其他联系和关系的人住到了一起,如果他们能把交往发展起来,自然能起到互补的作用。但更多情况下,由异质性所带来的心理隔阂却减少了邻里间的友好往来,甚至还相互提防,保守秘密。尤其对于老城区的住户来说,建立在被动基础上的社会流动和迁徙势必会减少新邻里间发生交往的可能,价值氛围不复存在,社会化的功能也被逐渐削弱。

案例1 孙先生,南京某冷冻厂职工,原家住唐山路,离单位不远的家属区,由于邻里基本来自同一个单位,彼此非常熟悉,既是多年街坊,又是同事。现在对新搬来的邻居不熟悉,也不想主动认识。

(3) 社会控制功能力度的减弱

邻里间还能起到相互约束和监督的作用,这是一种无形的社会控制力量,即通过有关活动与规范约束居民的行为,调整居民的关系,维持社区的一致性。这样不仅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创造一种祥和的生活氛围,对于社会大环境的整合与稳定也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如果说仅靠社会组织的正式控制来维持社会的安定,而缺少邻里间多年形成的习俗、道德、社会舆论等手段的支持,那么社会管理必然是缺失的、无效的和片面的。如今频繁的城市拆迁改造,也拆掉了既有的良好邻里氛围,迁后的社区也不可能在短期内使之得到重建,机械的住房重组很难带来良好的居住“软环境”等等,无疑都成了社区控制功能力度减弱的缘由。

(4) 交流功能的衰落

在邻里间,人们一般都能找到情感和思想交流的对象^[3]。人们在业余时间走门串户,即实现着感情和思想的交流,从而带来精神上的平衡和满足,并相互传递和感染。而拆迁势必会对被拆迁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上班族,他们首先要尽快适应迁后生活带来的与工作有关的变动:时间需要重新安排、调整,如往返家与单位之间所花的时间增加,

大多由市区内行程变为市区与近郊之间的往返了。闲暇时间减少,高节奏的非群体化生活使得人们无暇顾及邻里交往,长期下来,彼此之间感情淡漠;而对于老年群体,落差尤为明显,他们晚年生活的时间都是和其同辈群体度过的,而同辈群体最主要就来自其邻里。而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住户、非人性化的高层建筑却为原本社会适应力不强的老年人设置了重重障碍,晚年生活的单调、乏味、孤独、忧郁等消极情绪,加上心中压抑苦闷无处诉说,不仅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不能在晚年形成至关重要的完美感,更会导致身体上的疾病,平添身心的痛苦和家庭的经济负担^[4]。

案例2 严老,较早响应搬迁的号召,2003年中就从在下关区水上新村居住了近30余年的住所搬到了栖霞区幕府西路的一处经济适用房。现住在四楼。对于目前的生活状况,他和家人并不满意:以前房子虽旧,但出门全是熟人,平时一起打牌、下棋,朋友很多;原来老楼房最高就3层,现在高层建筑,越住越高,老两口腿脚不方便,上下楼也是个问题。

综上所述,城市拆迁一定会冲击到原先的邻里关系,甚至会由于政策规划不善、实施不力引发群体的衰落,从笔者此次调查中对社区邻里变化的留意就不难得出:社会分化加剧,使得初级群体原有功能不断发生外移,如邻里的互助行为,初级成员关系日趋松懈,人际交往更多的带有短暂性、间接性和功利性的特点,新环境的压力使居民忽视了最原初的情感交流,邻里观念淡薄,如今已成地理概念等。

虽然从长远来看,社区邻里初级群体由于拆迁或社会建设而日趋衰落的现象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例如提供个人更多的自由和发展空间,促进更大范围的社会整合,提高人类群体活动的效率等。但就目前的形势分析,它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引发初级群体,如邻里的分化、解构;导致社会成本的叠加等等。因此,笔者此次社会调查的目的,不仅要尽可能如实反映拆迁对社区邻里所造成的影响,体现出显在和潜在的社会问题,更要倡导社会的关注和舆论的支持,看到城市改造所带来的社区归属感的下降、社会成本的增加及社区人际网络的衰落,最终达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目的。

三、社区归属感方面

社区一词,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于1887年在《社区与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来的。腾尼斯认为,社区是居住在地域上的个人以成员身份属于集体的社会联合。这种社会联合不同于社会。社会是由分工和契约联系起来的情感疏远的社会团

体。而社区则是一个社会成员有强烈的社区归属感,彼此间关系亲密、出入相望,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团体。地域性、群体性和社区归属感是社区的主要特征。自滕尼斯之后,随着社区研究的不断兴起,社区归属感也成为社区研究中的重要话题。笔者在南京下关区沿江开发背景之下所做的居民调查,由邻里的层面切入,拟探讨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在城市拆迁改造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冲击和改变,思索培育我国社区归属感的可行路径。

归属感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来的。他认为,个体具有在自己所属的群体中产生出强烈的“我群体”的需要。这种对“我群体”的强烈认同,马斯洛称之为个体的归属感。所谓社区归属感,包括对社区地域和社区成员群体的归属。具体来说是“指社区的居民把自己归入本社区地域或人群集合体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感受既有对自己社区身份的确认,也带有个体的感情色彩,包括对社区的认同、投入、喜爱和依恋”。社区成员的社区归属感,是社区最本质的特征,离开了社区成员的归属感,社区的地域性和群体性将变得毫无意义。

简单说来,社区归属感指的是社区内的居民对社区地域和人群集合体的认同、喜爱和依恋等心理感觉^[3]。城市社区作为城市的基层组织,存在于其中的归属感无论对于城市还是城市居民都有重要意义。对城市而言,社区归属感表现为居民认可的社区亲切感和向心力^[5],有助于维持社区乃至整个城市的稳定与和谐,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整合机制;对城市居民而言,社区归属感为居民提供了一种除家庭之外的感情寄托的场所,有助于消除城市居民的孤独感和离群感,同时也有助于居民将个人目标和社区目标结合统一,有助于社区的发展和社会目标的实现。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受到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形态的影响,一些次属关系逐步取代了社区成员与亲朋之间的首属关系,同时社会的分化又引起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的差异,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城市居民的社区认同、归属感已经削弱,甚至消亡。理论界对社区归属感研究的焦点之一就是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否会削弱社区归属感。参阅之前的调查研究结果,总体上多数城市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较强,但也有不少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较弱。他们或是不太满意社区环境,或是对社区其他居民的评价较低,也有的认为社区没有亲切感。试想,对于普通城市居民来说,情况已然这样了,那么,刚搬迁至新社区的拆迁住户对于社区形成的归属感又会怎样呢?带着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笔者做了如下调查。

由于由下关宝善区迁出的居民多被安排在近郊

幕府西路的一个社区,在事先了解了大致全面的名单,并从中抽样了30户的小样本后,带着提前设计好的简单问卷和访谈提纲,笔者开始了有关拆迁户社区归属感状况的调查。

考察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取决于居民对社区的印象、评价以及他们对社区人际关系的描述。本调查主要考察社区居民对本社区的评价或满意度、对社区的依恋感、社区内的人际交往情况。

1. 居民对社区的整体评价和满意度

总的来说,居民对所处新社区的整体环境满意度较低。有67%的居民明确表示对所处社区环境不满意或比较不满意。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所处社区交通不便,离高级商业区较远;第二,环境不如从前,绿化面积小,娱乐基础设施缺乏,物业管理不到位,卫生管理不成系统,缺乏人文气息;第三,对同社区居民不太满意,认为新住户背景相对复杂,彼此之间很陌生,难以形成类似从前的良好邻里关系。另外,所处社区的治安条件、医疗条件等都影响居民对社区整体环境的满意度。

为了考察居民对他们所处新社区的主观评价,可从社区的安全性、趣味性、方便性、地段性、有利性等方面进行态度测量。结果,90%以上的居民明确表示地段很不好、很不方便,其评价均值在4分以下,居民对社区的安全性评价也较低,也在4分以下;至于趣味性,大多居民没有明确表示,这也许意味着社区的趣味性在居民以及甚至社区工作者心目中没有什么意义,居民没有感受到社区有趣味与否,可能是社区活动的普及以及开展不力所致。

2. 居民的社区依恋感

考察居民的社区依恋感,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反映出居民的社区归属倾向。我们主要考察了四个方面:一是居民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是否还会选择该社区;二是如果离开该社区,是否会有思念之感;三是是否仍对拆迁前的社区念念不忘;四是目前社区在自己心目中是否有亲切感。

调查结果表明,大多住户对目前社区缺乏依恋感;多数居民有流动的愿望,但缺乏行动的能力;相当数量的居民对旧社区很怀念,可能是由于在那儿居住时间较长,对邻里,对周围事物投入较多,因此才有较深的感情。在调查中,通过连续观察,新社区为居民所提供的情感关怀并不多,是导致居民依恋程度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3. 居民对社区内人际关系的感受

社区内的人际关系,指同一社区内,相邻或相近的居民日常的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邻里关系。

调查下来,住户的感触颇深,可能由于他们早已

习惯原先社区相对默契的邻里关系,突然搬到陌生的环境,一切都比较难以适应,并从内心里有抗拒心理。所调查的居民与邻居相互都不熟悉,通常由于住宅类型由原先老式楼房一下子转换到如今“火柴盒”式的高层单元楼,以及邻居间异质性的增强使彼此缺少沟通的话题。多数居民与邻居碰面时只是点个头,有的甚至没有任何表示,半年下来都不知道对方的姓氏。他们大多表示,这种表面化、广泛化,而且是非友情的邻里关系在其旧住处是不存在的。无形中,他们的交往时间变少了,对象单一了,除了单位的同事就是家人。平时串门的没有了,娱乐休闲的场所也不会出现在邻居的家中。

从总体调查状况看,不尽如人意。拆迁似乎并未给居民带来更多的福利,从某种程度上说,尤其考虑到邻里、社区归属感方面,对于他们也许是一种损失和政府的相对剥夺。当然这些结论也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例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年限等,这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研究。总之,随着现代人对腾尼斯所描述的,富有社区归属感的社区的追忆,作为社区精髓的社区归属感,已成为研究者进行社区建设必须予以重视的重要课题,探索培育我国的社区归属感,是社区建设的重中之重,同时也促进了城市拆迁改造之后对居民在新社区邻里网络建设良好与否的新思考。

四、调查结语与相关对策

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成本”是与社会效益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主要指由全社会,包括居民个体、家庭、社区、单位、政府等;以“以人为本”为实现社会效益而必须承担的除了经济成本以外的所有其他成本^[6]。

而由社会成本展开的研究,就很容易地归结到居民的邻里关系、社区归属感这些点上了。在对于以邻里为典型的初级群体在城市拆迁改造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各年龄层居民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拆迁前后邻里关系网络的弱化和淡化,新旧社区邻里结构的对比等,从这些角度去剖析初级群体所遭受的社会成本的损失。

城市拆迁产生的社会效益必须是扣除了社会成本之后的净效益^[7]。只有重视被拆迁居民的社会成本的研究,大力控制被拆迁居民的社会成本,才能进一步加强社会和谐和稳定,顺利实现城市现代化。而探讨社会成本则着重从邻里层面入手,以期待从以邻里为代表的初级群体的反馈中得出他们在城市拆迁改造时所经历的一系列变化,从他们的适应不良来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以此呼吁社会应有的重

视和关注,从微观和中观的层面研究城市拆迁改造究竟给居民带来了什么,以给予人文关怀,期待能逐步改变现今拆迁不为民的状况,让居民的损失受到关注,并争取在拆迁的过程中成为真正的受益人。

而实证调查表明,南京等城市居民怕拆迁、反拆迁,对立情绪和实际阻力不断增加。究其原因,正是城市改造过程中忽视了对社会成本的控制,巨大的社会成本已经超过居民可以接受的程度。这不仅仅反映在经济层面上,因为在现今城市文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更应在拆迁改造的过程中提倡和体现文明拆迁,更多地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去理解居民的困难和需要,适当地予以解决,不仅在过程中发现并解决问题,更要具备高度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尽可能地替居民着想,使得今后生活中的困难极小化。

从社会成本这个角度,笔者认为,政策制定者应该关注城市拆迁社会成本的社会承受能力,在居民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推进城市拆迁。为此有必要建立一套“被拆迁居民社会成本指标体系”,通过定量方法,随时掌握和控制城市拆迁的速度、进度、范围等。应当以城市随机抽样的本年度已经安置的成年居民为调查对象。抽样比例不少于1%。这一指标体系应当主要包括3个层次、10个方面:①个人家庭层次:个人心理满意度、个人生活满意度、经济补偿满意度、家庭群体满意度;②邻里社区层次:邻里关系和谐度、亲朋关系和谐度、社区环境文化满意度;③社会发展层次:城市空间和谐度、社会分化和谐度、政府形象满意度。

而根据各项指标,可以设置不同的态度数值,在调查后就能很快看出居民的满意度和相关态度,以供政策的参考。这样不仅可以使居民参与到政策及方案的制订,兼顾了政府、居民双方的利益,在协商、沟通的互动中使政策因此而透明化,社会矛盾大大减少,充分体现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初衷。

调查将重点放在了邻里社区层次,通过对居民社区归属感的分析,不难察觉,城市拆迁导致的社区层面的社会成本,使得部分居民不可避免地丧失原有传统性社区的那种邻里之间守望相助、亲密融洽的关系。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人们因住房关系而聚集到一起形成的社区,由于独门独户的结构以及形成时间较短,邻里之间多数不熟悉,关系较为松散,如新兴商品住宅小区、居民安置区等。所以,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对城市中老城区内的社区及其长期居住的居民的动迁应当慎之又慎,尽量做到合理化、人性化的安置,协助被拆迁户在新的小区内重建良好的社区归属感和邻里互动模式及人际网络,

使得拆迁带来的社会成本最小化,从而进一步推进社区发展,带动社区繁荣,创造一个充满信任的,互惠合作的人文环境。

参考文献:

- [1] 吴增基,吴鹏森,苏振芳.现代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40-142.
- [2] 杨善华.中国城市家庭变迁过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J].社会学研究,1994(3):12.

- [3] 丘海雄.社区归属感[J].中山大学学报,1989(2):14-15.
- [4] 姚远.稳定低生育水平与中国家庭养老关系的再思考[J].人口学刊,2000(4):23.
- [5] SMITH D D. Third World Cities[M]. London:Routledge,2000:111.
- [6] 李培林,张翼.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对中国10个大城市508家企业的调查[J].中国社会科学,1999(5):8.
- [7] 袁峰.政府经济政策运行的社会成本分析[J].理论探讨,1998(1):44.

(上接第14页)

参考文献:

- [1] SPENGLER J J.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antitrust polic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0(58):347-352.
- [2] MARVEL H P,STEPHEN M. Comparing restraints[J].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1996(48):473-86.
- [3] UNCTAD. 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投资、贸易与国际政策安排[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7:4-5.
- [4] 胡国良.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国际分工定位及其发展困局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5):59-62.
- [5] 孙斌艺.跨国公司垂直约束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0-91.

- [6] MASKUS K E,OTSUKI T,WILSON J S. An empiric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echnical regulations and trade[J]. The WTO and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2005(7):102-130.
- [7] 高文书.贸易技术壁垒经济分析[J].财贸经济,2003(9):58-63.
- [8] 高越,高峰.垂直专业化分工及我国的分工地位[J].国际贸易问题,2005(3):16-20.
- [9] 黄德春,刘志彪.环境规制与企业自主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06(3):100-106.
- [10] 侯铁珊,苏振东.绿色壁垒引致出口产业链技术创新效应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4(4):376-381.
- [11] 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陈小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662-663.

· 简讯 ·

河海大学获五项江苏省优秀软科学成果奖

2007年9月2日,在第七次江苏科技论坛开幕式上举行了“第二届江苏省优秀软科学成果奖”颁奖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院士、省委书记李源朝、省长梁保华等领导出席会议,并为一等奖获得者颁奖。河海大学此次共有5个项目获奖,其中独立完成4项,位居全省高校第一。获得一等奖的有:郑垂勇教授主持完成的“南水北调工程江苏段管理体制研究”。获得二等奖的有:赵敏副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基于水权理论的南水北调工程确定理论与方法研究”;王慧敏教授主持完成的“江苏资源—环境—经济发展诊断预警及对策研究”。获得三等奖的有:姚纬明教授主持完成的“江苏省研究生教育质量调研”,魏长升副教授参与完成的“新会计准则在企业管理实践中的应用”。

(本刊编辑部供稿)